

1903

珠海文史

第

11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珠海市委
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图1 1949年11月9日，马万祺(后排左2)先生率领澳门工商界代表团到中山县(包括珠海)慰问中国人民解放军，当时，由韦虹(讲台站者)同志接待他们。



图2 1949年11月9日，马万祺(中间者)与韦虹(右1)同坐合照。



图3 作曲家韦虹1976年在家

(本页照片均由张葳提供 珠海市博物馆收藏)



图4 杨维学烈士
生前自绘像

(杨文清供稿)

图5 1941年2月5
日,日本侵略军海军大将
大角岑生等乘坐的飞机在
丰门黄杨山坠毁的残骸

(广东省博物馆供稿)





图6 1937年至1945年，日军侵占三好岛，在海澄村开办“兴亚第二国民小学”，实行奴化教育。图为1943年该毕业班师生合影。

（陈福炎供稿）



图7 “兴亚第二国民小学”部分师生在校门前合影

（陈福炎供稿）



图8 1937年至1945年，日本侵占三灶岛时所用过的军票纸币。
(陈福炎捐赠 珠海市档案馆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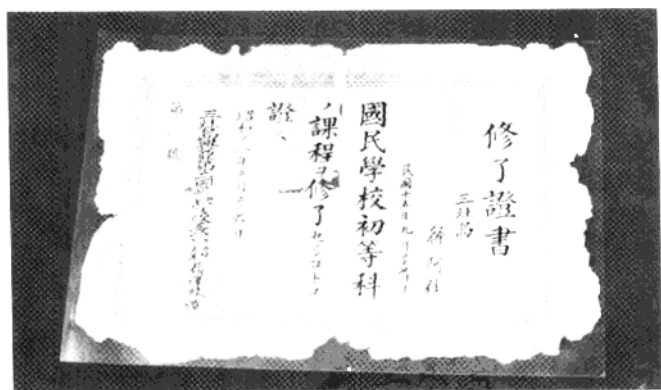


图9 图为三灶镇下表村徐佳先生当年在“兴元第二国民小学”读书的《毕业证书》，上有校长稻泽纹治于昭和十八年（即1945年）的签名。
(徐佳捐赠 珠海市档案馆收藏 何磊摄影)

目 录

我在大革命时期的经历	杨青山(1)
黄杨山区革命斗争史略	黄春炳整理(8)
张玉阶烈士传略	欧阳平 谢燕章 吴金喜(45)
杨维学烈士小传	麦红军 吴当鸿(57)
作曲家韦虹	张力克(62)
凤凰山区群众爱戴游击战士纪事	冯 永(75)
日军侵占三灶实行奴化教育的见闻 ...	陈福炎(81)
荷包岛历史概况	赵立林(84)
横琴岛简史	梁振兴(90)
南屏沙田疍家婚俗	吴金喜搜集整理(109)
南屏沙田民歌	吴金喜搜集整理(119)
后记	(128)
征稿启事	(129)

我在大革命时期的经历

杨青山

我今年 94 岁，在旧社会度过了 44 个春秋，经历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等几个历史时期。所亲历的事情有的已经忘记了，有的仍历历在目。回想往事，我深深地感到，个人的命运，总是与党和国家的兴衰荣辱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一

我出生于南屏镇北山村，与杨匏安（1896—1931）是堂兄弟。杨匏安比我大 11 岁，是大伯父杨富祥的儿子。他 15 岁丧父，大伯母陈智带着他和庶母关秀芝（大伯母的陪嫁女）过着清寡的生活。我 5 岁丧母。不久，我父亲杨款祥另娶。继母对我另眼看待，我只好到杨匏安家去。大伯母心地善良，待我像

亲生儿子一样。从此，大伯母、杨匏安、庶母关秀芝及我四人合成一个家。

杨匏安小时候在恭都学堂（在前山镇）读书，后来考上两广高等学堂（即广州的广雅书院），大伯母变卖田地也供他上学读书。杨匏安毕业后，回到恭都学堂当教师。后来，因为揭发校长贪污渎职，反遭诬陷，被扣以“图谋不轨”的罪名关入监狱。大伯母四处求情保释，才使杨匏安出狱。第二年，杨匏安筹集了一笔旅费，跟堂叔杨章甫到日本求学。在日本，他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为他日后投身革命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10岁那年，他从日本回国，在澳门当家庭教师，把我们都接到澳门。我跟随他的身边，开始读书了。

1918年，杨匏安结婚不久，我们举家从澳门迁到广州，在司后街“杨泗儒书室”住下。那时，全家的经济负担都落在杨匏安肩上。他白天在时敏中学教书、到道根女校讲诗词作文，晚上为《广东中华新报》等报刊写稿，挣钱维持家计。他日讲夜写，孜孜不倦。我跟随他身边读书，渐渐地发觉他心里装的不仅仅是一个家。大伯母很支持杨匏安的工作，为改善家庭生活，她和嫂子吴佩琪买来了缝纫机，做起裁缝和针线活，挣一点钱来补充家用，减轻杨匏

安的负担。

二

俄国“十月革命”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影响很大。1919年，中国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这时候，杨匏安积极投身这场运动，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日夜奔忙，先后写成《美学拾零》、《世界学说》等文章，交由《广东中华新报》连续登载。通常，他把写好的稿件交给我连夜送到报社（在第七甫）去。

我堂叔杨章甫的粤语和国语讲得很好，还懂日语。他在“杨泗儒书室”里开办了一个“注音字母讲习班”，来学习的人很多。1920年，陈独秀被聘为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他从北京来到广州，住在昌兴路（现在新大新公司旁），他经常找杨匏安，也来“杨泗儒书室”考察“注音字母讲习班”。他不懂粤语，就叫杨章甫为他当翻译，还经常要我为他联络交通。1921年，中国共产党广东支部在广州建立，杨匏安、杨章甫都加入了党组织，“杨泗儒书室”里的“注音字母讲习班”成了广东党支部开展地下活动的阵地之一。每当党组织有活动或有要人到来时，大伯母、嫂子和庶母就自动自觉到门外看守，关

注周围的动静。

1923年,我18岁,正式参加工作了。我被调到苏联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处工作。当时办公室设在广州东山,由李瑞(即越南的胡志明)、包惠僧、夏松云(女,包惠僧之妻)和我及一位打字员共5人,配合鲍罗廷开展工作。我于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党组织调我到中山搞农民运动。我和李华炤等一群青年到了中山石岐,组织群众成立“县农民协会”,打土豪,斗地主。农民群众感到开心,可是,那些土豪劣绅却恨死我们。他们串通一气,组织民团,捣毁农会,要抓我们、杀我们,到处贴告示通缉我们。当时的社会恶势力如“竞进社”等反动组织非常强盛,我们斗不过他们,只好回到广州向陈延年(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独秀的儿子)汇报情况,陈延年留我在广东区委党部工作。

1924年,孙中山先生改组了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了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准备东征、北伐,同时,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蓬勃兴起,形势一片大好,广东成为全国的革命中心。当时,中共中央的同志如蔡和森和刘少奇负责领导工人运动,周恩来负责黄埔军校政治部的工作,杨匏

安当时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国民党广东党部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1926年1月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委),他们经常来广东省委指导工作。大家进进出出于省委党部和“杨泗儒书室”,或开会,或作(听)报告,或商量工作。当时我在省委党部工作,经常与他们见面打招呼。“杨泗儒书室”原是北山村杨氏家族在广州建的一座为读书人用的祠堂,与粤华路的“省长衙门”为前后两座,中间有一甬道相通,联络工作比较方便。每当党组织在“杨泗儒书室”召开重要会议的时候,往往以杨章甫的“注音字母讲习班”作安全掩护。在“杨泗儒书室”里,我听过苏联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和周恩来等所作的形势报告,听过刘少奇所作的有关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的报告等。

1926年春,我调到石井兵工厂去开展工人运动,支持省港工人大罢工,公开的身份是训育员。训育部主任是谭天度(中共广东党组织的创始人谭平山之侄)。不久,我又调到国民革命军司令部特别党部去工作,鲍惠僧(后来叛变)当主任,我当组织委员。那是北伐前夕,军队有着极为严明的组织纪律。记得我第一次代表司令部向官兵们进行每周例行的军政训导的时候,一进操场,看见那几百人的队

伍队列整齐，军容威严，不论老将还是新兵，个个肃穆恭正，真使我吃惊！7月，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大部队向北方挺进，我们特别党部仍然留守广州，支援北伐。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势力日益抬头。廖仲恺先生被暗杀，国共两党出现了明显的分裂。1927年，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在上海制造“4.12”大屠杀事件，又在广州制造“4.15”大屠杀事件。大批共产党员被逮捕，遭杀害，中共党组织受到严重的破坏，革命形势急转直下。为避免大的损失，4月27日，党组织派我到香港接待和救护脱险的同志，以及负责《红旗》杂志（党的刊物）的印刷出版。我到香港不久，就听到“八一南昌起义”的消息，这是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第一枪的消息。“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起义军的高级领导人贺龙、刘伯承等同志也来到香港避难，由我和一位女同志负责接待他俩，就在香港上环薄扶林道我们单位里住下。贺龙的胡须很有特征，他担心国民党第四军张发奎的人（他和这些人很熟）认出他，就向我借须刨要刮须。他说：“当年曹操要割须，今日我也要刮须！”说得大家都笑了。说着，他就将须刮掉了。“广州起义”前夕，贺龙、刘伯承等领导陆续回到

内地开展武装斗争。

为了挽救中国的革命，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了“八七会议”，瞿秋白、毛泽东、周恩来、苏兆征、杨匏安等出席了会议。会议通过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大屠杀的总方针。1927年12月11日，共产党人张太雷、苏兆征、叶挺、叶剑英等发动和领导了“广州起义”。可是，由于敌强我弱，加上张太雷在战斗中牺牲了，起义相峙三天便失败了。12月16日，我在香港接到杨殷（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兼军委书记，中山县人）的紧急通知，要迅速营救和接待参加起义的同志。我们立即行动起来，接待了一批又一批脱险来港的同志，帮助他们解决吃、住、治伤等问题，千方百计地协助大家转移、疏散。香港政府知道我们的行踪，也要逮捕我们。一片白色恐怖笼罩着大地。这时，党组织要求我们坚定信念，化整为零，各找出路，分散行动，潜伏下来，等待时机去迎接新的战斗。我被安排搞地下交通工作，到了怡和公司“日星”号轮船上做工。我踏上新的岗位，航行在香港——广州、香港—汕头—上海—青岛的地下交通线上。

〔杨青山同志系珠海市离休干部，市政协第一、二届委员。〕

黄杨山区革命斗争史略

黄春炳整理

以黄杨山脉为中心的斗门地区(当时属中山县八区),解放前活跃着一支抗日游击队——中山八区抗日游击大队。这支游击大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人民生死与共,并肩战斗。他们北上五桂山,南下大虎,移师新会,挺进粤中,痛击日寇,袭歼伪军,惩霸除恶,杀敌锄奸,前仆后继,英勇顽强。他们经受了血与火的严峻考验,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谱写了斗门革命斗争的辉煌篇章。

一、建立党组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1924年冬,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二届结业学员梁瑞生(梁九胜)来到六乡月坑村,通过办夜校、农民剧社等形式,向群众传播革命道理。不久,

组织成立了月坑等七条自然村的农民协会，建立了 538 人的农民自卫军，掌握枪械 340 支。1927 年，这些革命的群众团体，虽然受到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镇压，但大革命时期播下的火种，为后来建立中山八区党组织和地方武装创造了条件。

1932 年春，外出求学的邝任生，毕业回到家乡小濠涌后，介绍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陈杰、谢英两人到八区，以文化教育为阵地，传播马列主义。1936 年夏，陈杰在八区介绍邝任生入党。接着，邝任生发展了邝叔明、邝振大等人入党，并经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批准，于 1937 年 10 月成立中共中山县八区小濠涌支部，邝任生担任支部书记。1938 年 6 月，小濠涌党支部从原属“南委”（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领导改属中山县委领导，并于同年 10 月成立中共中山县八区区委，由邝任生任书记，邝叔明任组织委员，邝振大任宣传委员，全区党员 24 名。随后，乡党支部发展到 8 个，革命的火种迅速扩散到八区的每一个角落，掀起了黄杨山区的革命斗争群众运动。

1937 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后，八区党组织发动广大群众，组织成立民众抗战后援会，各乡相应成立抗日救亡工作团。全区工作团成员有

800 余人。各团设有大刀队、宣传队、救护队，还组织演讲队和宣讲队，在全区巡回宣传，发动群众募捐，支援前线抗战。他们举办农民夜校，传授文化知识，宣传抗日救国道理，以唤醒民众。

1939 年 1 月，八区区委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组织群众建立了“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中山县八区中队”（简称“抗先队”），由梁其颖任区队长。全区共有 11 个乡村成立了“抗先队”组织，抗先队员达 1000 多人。2 月，由区委领导的“中山战时妇女协会八区分会（简称“妇协会”）成立，邝健玲任分会会长。随后，8 个乡村也成立了“妇协会”，全区妇协会会员达 300 多人。

“抗先队”和“妇协会”在区委的直接领导下，积极开展抗战工作。同年 2—5 月，区委在南门乡新围村崇基祠举办了有 60 多名抗先队员参加的游击训练班，以“抗大”的校风为训练班班风，还选派党员和进步青年到各级培训班受训，赴延安学习。“妇协会”则组织救护队，在日军飞机轰炸时冒着生命危险抢救被炸伤的群众，还举办“夜校识字班”，动员广大妇女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1939 年 4 月，区委书记邝叔明参加了中山县委在四区江尾头村召开的第二次武装工作会议。会

上,东南特委委员、宣传部长杨康华传达了党中央和省委关于“独立自主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研究如何发展壮大中山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计划。会后,邝叔明回八区传达了会议精神,经区委研究决定:1、以八甲乡作试点,组建一支60多人的武装队伍,沿用中山县民众抗日自卫团第二十八大队(简称二十八大队,这是当时国民党的民众武装番号,是公开的、合法的)的番号,由我党安插当八甲乡长的中共党员李成才任大队长,邝叔明兼副大队长,莫逢湾任政训员;2、适当时候在月坑村组建一支由区委直接领导的人民武装。

二十八大队成立后,驻防在新堂、贵头、八甲等地,监视着已入侵三灶岛的日军的动向,开展抗日活动。后遭到国民党中山县党部的抵制干扰,二十八大队只好停止活动。

二、建立抗日据点,开展敌后游击战

1939年7月,中山县八区区委总结了前段武装斗争的经验和教训,认为要掌握好枪杆子,必须建立一支在党绝对领导下政治素质好、战斗力强的武装队伍,并选择一个可靠的据点。经研究,认为选